

- [5]王列生. 论民间仪式的文艺承载 [J]. 深圳大学学报, 2006, (6): 89.
- [6]陈谷嘉, 邓洪波. 中国书院制度研究 [M]. 杭州: 浙江教育出版社, 1997: 443.
- [7]刘导琪. 古代的私塾 [J]. 河北教育, 2005, (8): 43.
- [8]贾利, 郁万彩. 中国古代书院教育的特色启示 [J]. 中国电力教育, 2009, (6): 181.
- [9] [12]朱熹. 朱文公文集 (卷七十四)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4.
- [10]张伟, 邢舒绪. 程端礼及其《读书分年日程》 [J]. 宁波大学学报, 2004, (6): 41.

- [11]何华连. 浙江古代的书院 [J]. 浙江师范大学学报, 2002, (2): 68.
- [13]邓洪波. 中国书院的教学管理制度 [J].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 2005, (5): 38.

作者简介: 陈晓龙 (1962—), 男, 甘肃镇原人, 西北师范大学副校长, 哲学博士, 西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教育部高等学校哲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 国际儒学联合会理事。主要研究方向: 中国哲学、思想政治教育。

责任编辑: 林杰; 校对: 亚中

论儒家思想的社会化

符得团

(西北师范大学 研究生学院, 兰州 730070)

提 要: 文化选择是历史长河中的水到渠成和自然而然的現象, 中国人选择儒家文化, 就在于古代个体思想家们所提出的具有普适性、共同性的道德原则和价值观念具备可社会化的内在潜质, 具有可普遍化的外在社会条件, 所以能够转化和上升为中国社会的普遍性文化价值原则和道德理念, 从而为人们提供了时代所需的文化营养。

关键词: 儒家思想; 道德原则; 潜质; 社会化

中图分类号: B8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3637(2010)04-0115-04

文化的核心是价值体系, 传统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脉, 从而也为中国古代社会提供了基本和普遍的价值原则。那么, 儒家思想是如何成为社会基本和普遍的价值原则或社会化的, 这就是本文所要探究的主要问题。

一、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生发的时代背景

马克思主义认为, 在社会历史领域, 无数的个体意识 (小我) 相互影响、相互作用而产生合力, 这种合力作用的结果便是民族心理、阶级心理的形成。而在这个合力的孕育形成中, 每个个体意识都有贡献, 但当时的杰出人物往往能首先把握社会心理中新的元素, 首先觉察到历史演进的趋势, 把散漫的群众意见集中起来, 适时地提出符合社会要求又超越该历史现实的先进思想, 从而形成 (上升) 为一种民族心理和阶级心理。

以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论述历史的起源与目标时提出的观点为代表, 学界普遍认为公元前 800 至公元前 200 年之间, 尤其是公元前 600 至公元前 300 年间, 是人类文明生发的童年时代, 雅斯贝尔斯将其定义为“轴心时代”。这是一段人类精神文明取得重大突破的时期, 各种文明都出现了伟大的精神导师——古希腊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 以色列有犹太教的先知, 古印度有释迦牟尼, 古代中国有孔子、老子……他们用理性思维和道德立论来审视这个世界, 超越和突破了原始文化, 提出的思想理念不仅塑造了不同的文化传统, 而且一直影响着后期人类的生活与文化发展。在这个轴心时代, 中国的思想先驱们共同铸造了东方人的精神家园, 他们的世界观、价值观以及理智的思维方式, 为后世文明的演进提供了一张框架“路线图”。如果说这幅图在理论上告诉人们, 世界是什么样的? 一个人何以安身立命? 那么针对春秋战国的时局和最后

由秦统一全国的历史现实, 儒家在治国方略上顺势应变而主张的“以德服人”反对“以力服人”的政治路线, 便最终获得了“儒术独尊”的社会地位, 为儒学这种极具地域性、个体性的思想理念社会化和上升成为当时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普遍文化价值原则和道德观念奠定了基础。

二、儒家思想社会化的内在潜质

(一) 道德立论。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 儒释道三教鼎立的文化格局, 两千多年来, 以其博大精深铸就了中国传统社会的宏伟殿堂, 又以其经世致用的文化精神与人们的社会生活发生着密切的关系。“德, 国家之基也。”^[1] 中国人最深刻了解、最精心培育、最致力完善的東西就是道德。相比较而言, 儒家文化是入世文化, 佛、道都是出世文化, 佛教修行的目的是成佛, 通过正心诚意追求一种不生不死的涅槃; 道教修行的目的是成仙, 通过外炼金丹和内炼心丹, 追求长生不老的逍遥; 儒学是中国最古老、影响最大的学派, 儒家修行的目的是内圣外王, 通过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追求天下大同的理想世界, 注意把个体放在集体当中去实现其人生的德性价值, 因而在这一方面能够形成强大的凝聚力量, 保持民族的向心力和组织的集体精神。

对于个体而言, “德者, 得其性也。”^[2] 德性就是“得”从“天命”而来的善性。因为“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 以其有德性耳。当为而为之谓德, 为诸德之源; 而使吾人以行德为乐者之谓德性。……德性之基本, 一言以蔽之曰: 循良知。一举一动, 循良知所指, 而不挟一毫私意于其间, 则庶乎无大过, 而可以为有德之人矣。”^[3] 于是, “中国人的整个心灵好像被它所统治着, 致使他们的全部哲学, 直无暇以计其他。全然避免离世绝俗的

理想,不卷入宗教的夸耀的宣传,这种建树德性的中心思想,经由文字、戏剧、谚语势力的传导,穿透到最下层的农夫,使它有一种可凭借以资遵奉的人生哲理”^[4]。人们在日常交往中,倾向于人与人关系的和谐默契,倾向于人与人的心领神会和情感互动,真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5]“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6]受这种建立在宗法血缘关系基础上的伦理性文化影响,道德性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突出特性。

(二)文化生命。文化是立国之本,中国的传统文化可以概括为“尊祖宗、重人伦、崇道德、尚礼仪。”^[7]中国传统文化强大而持久的生命力,自然有其可资汲取的不竭资源。首先,中国传统文化绵延发展,源自于中华文明的强大生命力。相对于在历史上盛极全球的古罗马帝国等其他三大文明,中国是唯一在世界上历经数千年存续和发展至今而不绝的。究其原因,始终以传统文化为立国之基并保持其道德教育特色,是根本所在。这种文明现实既是社会基础,又是文化后方,因为以儒家传统伦理道德思想为主脉的中国传统文化,属于一种具有持久连贯性和地域权威性、同时具有历史轴心意义的特殊文化传统,故而绵延发展两千五百多年,至今仍然极具东方代表性的显示着它不竭的勃勃生机。虽然近代以来接二连三地受到新文化运动的冲击,出现过间歇性断裂,但其不仅没有丧失对现实的文化解释力量,而且在不断的内在批评与外在批判中获得了发展,至今在中国本土和其周边地区如日本、朝鲜、韩国和东南亚等地发挥着深远而持久的文化影响。其次,这种强大而持久的文化生命源于以儒学为主的中国传统文化自身的开放性。尽管在中国古代传统社会里,儒家文化本身也历史地具有自我封闭性和排他性,但总体上中国传统文化始终保持着一种理性宽容和思想开放的本色。而且中国传统文化本身就是在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自由竞争中生长发展起来,并在尔后漫长的文化发展历史长河中,先后遭遇并接纳了印度大乘佛学、西方基督教等异域文化,不仅实现了儒释道三教合流,而且逐步自觉地接受内化了来自西方的经济和科技等知识。正是这种源自文化本身的开放性和适应性,使中国传统文化得以绵延生长,也成为促进它自身强健发展的外部动力。最后,中国传统文化绵延发展而不绝于世,源于其对自身内在思想体系不断维护发展的高度自觉和强烈意识。文化总是在连续不断的继承与创新中发展的,没有继承,文化就会断裂;没有创新,文化就会枯竭。从孔子继承二帝三王的思想而创立仁智心性之学起,经过历代贤哲的努力,中国传统文化始终以自身为主体,立足于解释和回答所处不同时代的基本问题,自觉吸纳其他文化的积极因素,不断推陈出新和自我发展,始终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

(三)普适关怀。中国传统文化的普适关怀表现为朴素的成人之道,面向社会的每一个个体,通过学习、教育和修养,追求仁、义、礼、智、信统一的理想人格,并以成就圣人和君子为德育终极目标。要做到这些,就要通过修己自胜的功夫来实现,所以“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8]修身,就是修身养性,修身洁行,休养生息。因为“中国人讲道理,只从普通人日常人生出讲,日常小事皆人生之隅,

隅之道,可通他隅。”^[9]即使是“圣人教人不过孝弟忠信,持守诵习之间,此是下学之本。”^[10]因此,古代先哲非常重视对个体品德的培育,儒家自孔子开始就十分重视修身,孟子提出仁、义、礼、智四端,认为修身要以反省内求的方法,使个人的行为同社会道德要求相吻合;墨子、荀子主张习与性成,认为人是环境与教育的产物,通过修身行为可以化性起伪,人就可以“积善成德”;老庄认为人的自然状态最美好,所以对人为采取完全否定的态度,坚持无为而复归于自然以成真人。

文化选择是历史长河的“水到渠成”,是自然而然的事,人类选择某种文化,就在于其能否为人们提供时代所需要的文化营养。与自然农业经济的自给自足性特征相适应,儒、释、道融合而形成的中国传统人生伦理智慧,同样具有自给自足性。对个体而言,它建立了一个富有弹性的安身立命基地,进退相济,刚柔并用,得意时依儒家,失意时有道家,绝望时归佛家,于是中国人在任何境域下都不会丧失安身立命的基地^[11]。所以在中国古代先民的文化生命里首先涌现出的是“脩己以敬”和“脩己以安百姓”^[12]这一主流道德政治观念,而由这种道德价值观念统率,中国传统文化生命的滋长延续以及后来的发展,便自然沿着尽心、尽性、尽伦、尽制的尽理心路,所有问学功夫均纯粹向里用心,将一切问题都系于人民之能安不能安,君相之是能否正德,而后发展成为圣贤学问,这种精神理路的必然归宿当然就是追求圣贤人格。这便是中国文化生命之德风,是中国古代个体品德培育的指导思想。

三、儒家思想社会化的外在条件

(一)经济条件。任何文化形态的产生与发展,都离不开其所依存的社会生产和生活方式。中国传统文化作为古代华夏“民族生活的样法”^[13],它所形成和发展的基础,取决于中国传统小农自然经济以及在其基础上形成的宗法制社会结构。中国是世界上农业发展最早最充分的国家之一,早在仰韶文化时期,从今天的甘肃省到河南省之间的整个黄河中游地区,就已出现了农耕业的萌芽。“后稷教民稼穡,树艺五谷,五谷熟而民人育。”^[14]到了夏商时期,中国的农耕生产已达到了较高水平,殷商时已根据农业生产活动的周期性制订出了测查岁时的纪年法和纪时法。进入周代以后,农耕生产继续受到重视,《尚书》记载有周公以知稼穡之艰难告诫成王不能贪图安逸的情形:“呜呼!君子所其无逸,先知稼穡之艰难,乃逸。”^[15]当然,这一时期的农业生产技术还比较原始和落后,与这一自然农业经济相适应的中国古代农业社会,是以家庭为基本单位,以手工为主要生产方式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分工不发达,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满足家庭及其成员生产生活需要而不是交换。

中国古代传统小农自然经济及其与之相适应的宗法制社会结构,不仅是农业文化产生和发展的温床,而且也是以儒家文化为主脉的中国传统文化成为社会普遍价值原则的基础。首先,小农自然经济方式,决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农业文化性质,安土重迁成为人们的文化心理,“安土敦乎仁,故能爱”^[16]不仅是孔子仁爱思想的源泉,而且是中华先哲们“不能安土,不能乐天;不能乐天,不能成其身”^[17]的思想认识基础。安土重迁思想使人们习惯于在故土上周而复始的从事农业生产,习惯于这种自然经济所带来的安宁与平和,“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既是农民自身的要求,也是当时统治者所期望

的,因为社会成员的自我封闭和彼此独立,人们思想守旧,迷信权威,惧怕变革,对于实行外儒内法的统治者而言,无疑是绝佳的社会治理状态,产生于斯服务于斯的儒家文化上升为社会主流文化形态,理所当然。其次,古代中国地处内陆地区,决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大陆文明特征,家国同构体制使伦理本位主义思想盛行,社会管理制度是家长制,因而中国传统文化更加重视社会人际关系的协调与制度建设。加之人们世代聚居在同一个地方,长期生活在一起,在这个熟人社会里,人们彼此之间相互了解,每个人的身份和地位都比较确定,因而个人的习性品德就成为他安身立命的首要条件,一个人只有具备良好的口碑和声誉,才能赢得他人的尊重、信任和接纳,而良好声誉和德性的获得以及基于教化的成人训导,对于统治者和每个社会成员而言,都显得十分重要,以仁义道德立教的儒家文化便自然成为古代个体品德培育的指导思想。

(二)政治条件。中国古代是一个宗法血缘社会,人治为政治系统运行的基本方式,社会的演进不是以阶级对抗为动力和特征,所以在历史上发生大变故的春秋战国时期自然也不是以阶级对立的对抗斗争方式进行,而是在法家推行严刑峻法制度下,西周时期的贵族政治与井田制崩坏所导致的王朝更替。“春秋无义战”^[18]的结果,君王从贵族政治占有的优势与束缚中超脱出来,而成为一国元首,拥有无限的权力而取得了统治地位;民众则从井田制下对贵族的人身依附关系中解放出来,而成为相对的自由民,取得自给自足的自由生产地位;士大夫们则由于贵族堕落而得以超升,以其贤才取得了替君王掌握国家治权之地位,其中不乏地位显赫者,但大多仅以个人身份出处进退,其最高愿望就是践宰相之位而以天下为己任。这是继夏商周三代旧制,历经春秋战国催生而在秦汉大一统后所形成的中国古代社会政治分野或集团成分,而就是这君、士、民三重结构的社会政治格局,在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一治一乱之王朝更替循环中,一直延续到辛亥革命。

针对小邦周灭亡大邦般的历史变故,西周统治者认识到统治天下不能单靠天命而要依靠德行,原来强大无比的秦王朝过早覆亡,也使法家推行严刑峻法的政治实践过早的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那么解决如何限制和安顿皇帝无限权力的时代问题,就自然落到了积极入世又不走极端的儒家肩上,而儒家限制君王的唯一办法就选择了修德与“天命靡常”的警戒,因为“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民心无常,惟惠之怀;为善不同,同归于治;为恶不同,同归于乱。尔其戒哉!”^[19]既然皇帝是真龙天子,就要法天,天是无限体,皇帝就要和天一样,统治者要享有天命,做到长治久安,就要讲德行,以德配天。因为“天子者,与天地参,故德配天地,兼利万物,与日月并明,明照四海而不遗微小。其在朝廷,则道仁圣礼义之序;燕处,则听雅颂之音;行步,则有环佩之声;升车,则有鸾和之音。居处有礼,进退有度,百官得其宜,万事得其序。”^[20]后来,汉武帝之所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并且前后两千多年间儒家一直居于中国社会意识形态之主导地位,就是因为儒家主张的“尊尊亲亲”伦理制度合乎封建统治者的需要,他们强调的“德政重民”思想有利于缓解统治者与劳动人民的矛盾^[21]。儒学和君主专制主义皇权相结合,得到了统治者的支持、提倡和保护,而中国的封建统治阶级也便是通过对儒家的各种解释和保护来获取并维护他们自身的既得利益的^[22]

(三)文化氛围。首先,春秋战国时期的时局造就了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文化繁荣。这个时期的社会结构急剧变化,各种矛盾异常尖锐,列国兼并战争接连不断,当时诸侯各国的国君为了在争斗中取得霸主地位,竞相招贤纳士,运用不同思想学说以使自己的国家富足强大起来,因而各诸侯国对学术往往都采取宽容甚至扶持的政策,允许学术自由,这就为士人著书立说和发表个人的意见创造了有利条件,也大大促进了战国时期的思想解放和文化繁荣。其次,周朝衰微而“礼坏乐崩”,造成“天子失官,学在四夷。”一些王官史师散落诸侯国或流落民间致使“私学勃兴”。因为“古者学在官府”,那时的史官,既是官府的官吏,又是学校的老师。且“三代之隆,其法寢备,然后王官、国都以及闾巷,莫不有学。人生八岁,则自王公以下,至于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学,而教之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及其十有五年,则自天子之元子、众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适子,与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学,而教之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此又学校之教、大小之节所以分也。”“及周之衰,贤圣之君不作,学校之政不修,教化陵夷,风俗颓败,时则有若孔子之圣,而不得君师之位以行其政教,于是独取先王之法,诵而传之以诏后世。”^[23]中国伟大的思想家大多出现于这个时代,产生了各种思想流派。再次,社会经济的发展,使有闲阶层出现并能够从事自己的学术活动。如齐国由于经济发达、政治开明,以及给予士的优厚物质待遇,吸引了当时几乎所有的著名学派汇集稷下,而士人议论时政,又没有或者少有阿谀奉承的情况,所提意见及建议都是坦率直言,创新精神得到发扬,理论观点纷然并存,各种辩论时有发生,造就了百家争鸣的学术繁盛,也大大促进了思想学术的发展。最后,百家争鸣促进了儒学的发展,为其社会化奠定了学养基础。诸子百家虽从不同社会集团的利益出发著书立说,议论时事,阐述哲理,但各个学派之间既相互斗争又相互学习和借鉴,特别是后来孟子、荀子继承儒家思想主旨,吸收了其他学派积极合理的学养成分,战国后期的儒学便发展成为诸子百家中的蔚然大宗,不仅铸就了辉煌的中国传统文化,也使其成为指导古代个体品德培育活动的经世致用之学。

(四)教育传播。儒家思想上升成为指导我国古代个体品德培育的普遍性原则,教育传播功不可没。首先,儒术独尊造就了儒教的繁盛。中国文化的传播基本是以儒家教育为形式,自始至终,绵延一贯。开辟生命之源、价值之源,能立道德主体者莫过于儒家^[24]。自孔子开端,历代大儒都致力于通过教育来培养人,因而使儒家的理想人格学说深入人心,对传统儒家文化的社会普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次,儒教推动了“大学之道”的流行。儒家教育始终遵循着“大学之道”的内在逻辑和规则原理,这种以成就个体德性人格为基础的普世教育,具体展现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普世教化之道,教育实践由生命(自我)教育、家庭(家族)教育、社会(政治)教育、普世(理想)教育四个环节有机构成,教育目标直接指向个体品德、家庭美德、社会公德和大同理想。再次,“有教无类”的授徒标准有力地推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大众化和普遍化。“有教无类”是儒家一贯坚持的授徒与教化原则,所以对于招收学徒,孔子的标准是“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25]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26]在教育实践当中,儒者都坚持人格养

成应该在人伦关系中进行,并自觉建立起一种仁爱和信任的师生关系,使得教和学成为生气蓬勃的创造性劳动。今天我们读到《论语》中师友切磋与共同“言志”的那些章节,还能深切感受到当时弦歌诵读中的那些生动情景,这确实有利于人的真实品性的培养。最后,施教素材在教学相长中推陈出新,生生不绝。儒家从事教学活动必须有教材,而儒术在儒家的不断经解注疏中保持着常新不衰。孔子以礼、乐、射、御、书、数六艺教弟子,以《诗》《书》《礼》《乐》为教材,培养了许多通经致用的人才。后来的儒者继续以五经、十三经、四书教授弟子,在教与学的切磋琢磨实践过程中,众多的儒子对这些传统的经典不断注解、增华和解释,最初作“传”、注“经”、“释义”,后来注“疏”、“集解”、“正义”等,坚持用这种“我注六经,六经注我”的办法来积累经义,推进和升华传统,对儒学思想精髓的阐发与经解成果越来越多,使得儒学羽翼丰满,长为参天大树。不仅培养了经学的思维方法,而且儒家在其历史演变中也孕育出了一批善于“通古今之变”,具有“兼容并包”精神的大师。正是他们能够博古通今,注意从前人的遗产中吸取智慧,秉持“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27]的治学态度,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优秀人才,也使儒家文化之道统历经千年而不衰。

参考文献:

- [1]《左传·闵公二年》。
 [2]郭象·皇侃论语义疏引[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214。
 [3]蔡元培·中国伦理学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134。
 [4]林语堂·林语堂散文[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0:247。
 [5]《论语卷六·颜渊第十二》。
 [6]《礼记·礼运》。
 [7]司马云杰·文化社会学[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

398.

- [8]《礼记·大学》。
 [9]钱穆·宋代理学三书随鉴[M]·北京:三联书店,2002:148。
 [10]《日知录卷九·致知》。
 [11]樊浩·伦理精神的价值生态[M]·西安:西北科学出版社,2001:207。
 [12]《论语卷七·宪问第十四》。
 [13]冯契·人的自由和真善美[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95。
 [14]《孟子卷五·滕文公章句上》。
 [15]《尚书·无逸》。
 [16]《周易·系辞上》。
 [17]《礼记·哀公问》。
 [18]《孟子卷十四·尽心章句下》。
 [19]《尚书·蔡仲之命》。
 [20]《礼记·经解》。
 [21]张岱平·张岱平全集(第6卷)[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31-37。
 [22]刘得贻·中国的儒学统治[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4。
 [23]《四书章句集注·大学章句序》。
 [24]牟宗三著,罗义俊编·中国哲学的特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53。
 [25]《论语卷四·述而第七》。
 [26]《史记·孔子世家》。
 [27]《礼记·中庸》。

作者简介:符得团(1968—),男,甘肃陇南人,西北师范大学研究生学院副院长,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教育经济与管理。

责任编辑:林杰;校对:亚中

中国古代私学教育形式与个体品质培育

葛晓莉

(西北师范大学 政法学院,兰州 730070)

提 要: 作为我国古代官学重要补充形式的私学一直与官学并行存在和发展,并成为培养人才、发展文化和传播学术思想的重要场所。由于私学的特殊性,使其在个体道德品质培养中有着官学难以企及的作用。本文分别从私学的蒙学教育、教育形式、方法等方面来考察私学教育在个体道德品质培育中的作用。

关键词: 私学;教育形式;品质培育

中图分类号: B8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3637(2010)04-0118-03

中国封建社会一直存在着与官学相对而言的私学,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作为我国古代官学重要补充形式,私学一直与官学并行不悖存在和发展,成为培养人才、发展文化和传播学术思想的重要场所。私学是“不同政府主持,不纳入国家正规学校制度之内,由私人或私人集团(包括社会团体)来主持、经营、管理的教育活动”^[1]。“我国古代私学的发展经历了逐步制度化、规范化和多样化的历史轨迹”^[2]

春秋战国时期,诸侯战争频繁,社会动荡,秘藏于官府的典籍文物流散于民间,掌握着一定文化知识的官员也流落到下层。一种新兴的社会阶层“士”阶层应运而生,他们“不治而论”,纷纷通过创办“私学”这一途径来宣传自己的思想和主张。孔子最早创办私学,提倡“有教无类”,打破了“学在官府”的教育垄断局面,向下层子弟打开了教育的大门,使得“有教无类”的梦想在私学实践中得以实现。经过封建社会几千年的不